

中国“改革文学”的发展轨迹与突破困境 ——以《沉重的翅膀》修改历程为例

麻奕雯

四川轻化工大学, 四川 自贡 643002

DOI:10.61369/HASS.2025030012

摘要： 本文聚焦中国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的“改革文学”，探讨其形成背景、发展阶段及工人形象的演变，并以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四次修改为例，分析“改革文学”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创作冲突与突破路径。

关键词： 改革文学；改革小说；《沉重的翅膀》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and Breakthrough Difficulties of Chinese 'Reform Literature' — Taking the Revision Process of "Chen Zhong De Chi Bang" as an Example

Mi Yiwen

Sichuan Light and Chemical Industry University, Zigong, Sichuan 643002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form literature" in China from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exploring its formation background, development stages,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ker images. Taking Zhang Jie's "Chen Zhong De Chi Bang" as an example, it analyzes the creative conflicts and breakthrough paths faced by "reform literature"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Keywords： reform literature; reform novels; "Chen Zhong De Chi Bang"

“改革文学”指中国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批评。本文将对“改革文学”的形成发展、工人形象发展和在新时代的冲突进行分析。

一、“改革文学”的形成

“改革文学”的形成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一）政治的拨乱反正和经济的复苏

1976 年“四人帮”粉碎，随着同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建设重心转向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的扩大化自上而下带动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热情。在文艺理论的纠正和改革政策的开放下，“改革文学”在新时期初期的浪潮中应运而生。

随着农村改革的进行和 90 年代国企改革的深入，变革困难由单纯的工厂扩大到社会更大的层面，现实的困境触发作家的困惑，他们重新审视改革的方方面面，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变为微观的现实思考，工人阶级作为与改革变动休戚相关的群体被重点关注刻画。

（二）文艺理论的转变和创作者的能动性

“文革”时期偏激的思想理论与设想超脱时代经济的发展，这些理论反映在文学的塑造中，造成偏激主观的文艺工作和结果惨烈的文艺斗争，所以文艺方针的讨论成为新时期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此，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

结一致向前看》的第二部分中，邓小平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鞭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1] 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为文艺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文学中反应出新时期初期的创作风格——反思历史、回归现实，背后是创作者响应时代号召对文艺创作的作用因素。新时期伴随着文艺问题的纠正，创作者力求“回归当下”，着力描写改革时期的问题、生活等，将生活经验作为参照物，有目的的呈现出来、赋予创作意图。

二、改革文学的发展

第一批“改革文学”的崛起证明了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恢复效果相当可观，凭借出彩的文学表达，“改革文学”衔接起曾经断开了十多年的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改革文学”的发展依据不同时期的表达侧重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七十年代末的“典型型”改革文学、八十年代中后期到末期的“现实型”文学、贯穿整个九十年代的“写实型”改革文学。

（一）“典型型”改革文学

“典型型”改革文学以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乔厂长上任记》为典型。这类小说的主人公怀抱着对改革的美好期许和巨大热情，是响应时代号召又充满干劲的实干家，故事情节的发展局限于二元对立，主角会遇到保守派的阻碍。这与写作时代的政治精神和群众对于政策的积极号召息息相关，社会发展向好使得作品充满理想色彩。这类小说有的时候会将改革阻力描写简单化，如李向南在一天内解决了十多件陈年难题，作者忽视了正常人的精力有限、现实情况的复杂。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称《乔厂长上任记》为“典型的‘乌托邦’作品”^[2]，70年代末的改革文学作品大多具有二元对立的模式化和情节的套路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典型性。

（二）“现实型”改革文学

“现实型”改革文学将写作重点转变到普通人的生活描述。以《鲁班的子孙》为典型，作者选取的主人公已经从进取向上的“英雄人物”转变为更具有多面性的普通人，他们具有积极进取的向上心，也具有不完美的一面，更贴近现实。陈思和先生指出：“1985年后，作家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表现一部分人的改革热情或铁腕行动，改革精神也更多成为普通劳动者的自觉要求。”^[3]接近90年代初期，“现实型”改革文学逐渐贴近写实文学，如《大厂》《年底》等小说，作者不再为了事情发展而刻画扁平化的人物，更注重对人性的揣摩，以人物选择推动情节发展，反应出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迷茫与抉择。

（三）“写实型”改革文学

“写实型”改革文学结合二者，在90年代有了新的突破。英雄人物与普通人形象合二为一，主人公有奋进的改革精神，也会有种种疏忽和纰漏。叙述上不再是二元对立或单一结构，作者往往采用多线叙事的方式进行情节发展，将不同的人物展现在同一时代背景、具体生活情形里，刻画出多层复杂的人物形象，更为真实的反映出90年代的现实生活，如《大江沉重》、《抉择》。

三、工人形象的发展

“改革文学”本质是因“改革开放”现实的反馈和需要所繁荣发展的文学，叙事线索一般依赖于“改革”之路，人物设定围绕叙事线索，衍生出支持改革的“创新派”和反对变动的“守旧派”，对工人形象的刻画经历从模糊到具体的过程。

（一）基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而生的“新”“旧”两派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在工业领域率先展开，工厂一批陈旧制度急需改变，因此由于作品表达使命，前中期“改革小说”的主要角色树立“新”“旧”两派以彰显改革的困难和改革决心的无畏，作者选择工人干部为主要人物带动情节发展是必然的。

革命者大多为大学生、工人干部，意志坚定、锐意进取，遇到困难始终寻求方案以求突破，以八十年代初期的《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为例，乔厂长结合具体情况采用合理的整改方案，使得厂内“生产率短期内提高了一大截”；《沉重的翅膀》

中，郑子云担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后大力扩展新方案。

“反对者”大多处于工人干部的层级，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或者官权内斗反对改革，在小说中起到阻碍“创新派”改革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旧时代的遗留利益和问题，作为正面人物的主角也不例外，身上带着特定的时代痕迹，例如《沉重的翅膀》的主角郑子云曾任重工业部高官，在文革时期被打上“右倾机会主义”的标签^[4]。

（二）工人形象的刻画经历从模糊到具体

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相比，“改革文学”的人物刻画摆脱了模板化和“光伟正”的形象，《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在工作中雷厉风行，但作者没有将他塑造成完美的神像，让他在私德方面有所亏欠，这是人物性格导致的结局，也是在特定时代下小人物在情感生活中的摇摆。遗憾的是，早期的改革小说对于普通工人的叙述少之又少，大多着点于工人干部，这导致了对工人形象刻画的缺失。有文学批评家曾指出：如何表现当代青年和工农群众的联系，似乎是一个陈旧的问题，但却是表现好当代青年新人的一个关键^[5]。

在中后期，工人形象从背景板转变为时代里有喜有怒、自我发声的具体形象。由于国家经济形势的转变，作家将目光移向生活百态中的工人角色，以“写实主义”的风格写作，进一步拉近文艺作品与工人的距离。李肇正的《女工》中，女工金妹为人善良，朴实憨厚，作者没有执着于宏观历史的叙述，而是凸显个人困境，被金妹帮助过的工人领导最后名利选择无视金妹的苦楚，作品中将人性的善恶、社会冷暖描写得淋漓尽致。

上层建筑、经济发展导致写作者观察重点的转移，其对“改革文学”中工人形象变化的影响恰似巴赫金的结论：（人）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6]。

四、“改革文学”在社会转型期中寻求发展突破

张洁的小说《沉重的翅膀》刊登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十月》杂志，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界第一部反映改革初期生活的长篇小说^[7]。小说的出版并不顺利，1981年首次出版以来历经多次修改，一度使张洁女士面对社会方面的舆论压力。修改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文学创作和政治批评的冲突。《沉重的翅膀》是一部具有新的突破的作品，出版之初便遭到同期作家的担忧：小说把我们国家的一个部写得过于晦暗，问题是那样的多，积弊是那样的深，上上下下有那么多思想僵化、因循保守，心术不正、政治品质不好，反对党的路线、反对改革的干部……这个翅膀实在是太沉重了，究竟还能不能飞得起来？这使人不能不感到一种迷茫了^[8]。在改革之初，十三大中央积极寻求突破口，社会风气一派欣欣向荣。此时沉重的探讨、对于现实的深究必然与创作主流相斥，但面对依旧存在的基础问题，张洁女士没有选择回避，凭借着昂扬单纯的革命浪漫主义指出她所了解的尖锐矛盾，也因此遭到其他

作家不同创作立场的文学批评,这对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作家的个人思考无疑是带上枷锁。

第二,作家个人基于现实更深层次的思考。改革发展时期充满特殊时代的矛盾和复杂,以特殊时期为背景的文学创作要求作家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尽量减少创作中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感性抒发。早期张洁女士的写作萦绕着积极乐观的“苏联情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初稿的创作,因此张洁女士在对《沉重的翅膀》反复修改的过程中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修订本出版后获得《人民日报》的发文肯定:“不仅是增加了情节,丰满了人物形象,突出了主题,删去了不确切的议论”、“修订本保留了初版的精华,而思想上、艺术上又有了明显的提高。”^[9]修订本中,张洁女士修改了不合理的字词和句式,删去了累赘而广泛空洞的叙述议论,如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一万字讲话,使得文章脱去繁重沉闷,更为准确表达自身所想。

第三,改革开放年代人民朴素的社会责任感。小说删减部分不乏因遭到政治化的批判而被删改的讨论,阅读全文,不难发现张洁女士在遭遇部分作家批评后有选择性的、艺术化的修改,背后是不完全认同政治化文学批评的表现,也是对社会责任感的坚守。在《我为什么写〈沉重的翅膀〉》一文中张洁女士提到:“我所以写,是因为我对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还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便不再写了。”由此可见,《沉重的翅膀》的出版、修改建立于张洁女士对国家命运的关切,落笔于张洁女士对现实处境的反思。小说在出版、修改过程中极具“多方

合力集体创作”的特点^[10],《沉重的翅膀》在《十月》四、五期连载后张洁女士广泛听取读者和文学编辑、文学批评界的建议,尤其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的大力支持,“韦君宜始终给予热情的关注,1983年11月,她写了长达四页纸的审读意见,对修改稿作了充分的肯定,并逐项提出作者和初、复审遗留的问题,请作者最后改定。”^[11]在文学界、群众怀揣着广泛而朴素的关怀中,《沉重的翅膀》完成最终修订,张洁女士创作动机中对历史、人民的关切,与修订过程中编辑、读者朴素的社会责任感共同构成作品的底色。

这部作品的修改史为当代文学留下众多启示。文学的使命不仅是记录时代,更在于以审美批判推动时代进步,张洁对官僚主义的批判虽曾引发争议,却成为改革文学最珍贵的精神基因,启示后世作家警惕任何形式的体制僵化。在特殊历史语境中,文学表达的“弹性”并非软弱,而是智慧。作品中关于改革初期议题的精准捕捉使其成为不可替代的时代记录,这种“与时代共呼吸”的写作姿态,正是当下“现实题材”创作亟需重拾的精神传统。

站在新时代回望,《沉重的翅膀》的“沉重”早已超越具体的语境,升华为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永恒隐喻。当我们重读这部作品,看到的不仅是改革初期的社会图景,更是一代作家以文学介入历史进程的精神勇气。真正的改革文学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复制,而是以艺术的方式参与民族精神的重塑,这或许就是这部“修改之书”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参考文献

- [1] 王一梅. 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与“十七年文学”的关系——以“重放的鲜花”与旧文新生为中心[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0, (02): 35-46.
- [2] 李明. 从“改革小说”到“现实主义冲击波”[D]. 南京师范大学, 2008.
- [3] 王仁宝. 当代文学史视野中的《平凡的世界》[J]. 当代作家评论, 2018, (03): 81-89.
- [4] 李馥. “改革文学”时期工人英雄形象塑造模式研究——以《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沉重的翅膀》为例[J]. 文艺争鸣, 2021, (07): 198-202.
- [5] 张帆. 改革年代的文学与入学: “新时期”文学中的人性论重构(1979-1987)[D]. 上海大学, 2015.
- [6] 王金胜. 历史、叙事与现实主义——论关仁山《白洋淀上》[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3, (03): 91-103.
- [7] 燕然. 《沉重的翅膀》: 工业改革的沉重起飞[J]. 黄金时代, 2014, (06): 74-75.
- [8] 程光炜, 陈华积. 改革文学研究资料[M].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08. 371.
- [9] 苏奎. 《沉重的翅膀》的“沉重”修改[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20(05): 185-189.
- [10] 邹莉娟. 论张洁小说的叙事伦理[D]. 广西师范大学, 2014.
- [11] 周志雄. 改革时代的改革小说——重读《沉重的翅膀》[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56(04): 57-62.